
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¹

皮坤乾，杨秀琴

（铜仁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立足于贵州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准确把握其生态意蕴，充分彰显其生态价值诉求，对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推动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生态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8）01-078-082

基于贵州地域、民族尤其是文化上的特点，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首次明确将贵州人文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可以说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其生态意蕴，彰显其生态价值诉求，使其真正成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促进人们增强环保意识、推进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在这“一方水土”上又创造了“一方文化”。“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正是贵州各族人民世代在适应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过程中所创造并传承下来。

（一）“天人合一”是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

作为中华民族从长期实践中得来的理性认识，“天人合一”无疑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核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民族表现形式。就其实质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主要强调的是“天”与“人”之间“一”的关系。“天人合一”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环境的“合一”，人与他人、社会的“合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自我”与自身的“合一”。

之所以将“天人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原因有二。首先，贵州从古到今拥有得天独厚、良好的生态环境，最有资格讲“天人合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贵州星罗棋布，处处是瀑布、溶洞、峡谷、湖泊、森林、湿地，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园省”——四季如春、满目青翠，拥有清新、凉爽的天气，被誉为“天然公园”“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是我国首批三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

¹**【基金项目】**：贵州省 2014 年度省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基于翻转课堂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研究”（2014110）；铜仁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省级重点支持学科（ZDXK[2016]17）。

【作者简介】：皮坤乾，铜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杨秀琴，铜仁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其次，贵州先民在山区环境中形成并坚守了源于自然、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江南千重水，云贵万重山”。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依托的省份，贵州省 92.5% 为山地和丘陵，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地无三尺平”之说。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涵养了贵州先民“万物一体，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敬天畏天，顺应自然”的生态情怀，“因地制宜，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顺其自然，怡然自得”的审美情趣等等，“天人合一”思想早已默化为传统制度、民间习俗、社会风尚、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深深融入到贵州先民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如用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焚巾曲》，是用贵州苗语中部方言所唱的苗族古歌，为苗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歌中有“山岭是主人，人是过路客，生命极短暂”等经典语言，回答了生命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表达了他们对于有限生命死亡后走向永恒的哲学思考。这种生命有限以及自然与人的生命的主客伦理观，规范了苗族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在这种生命伦理规范下，人面对养育人的自然，应该感恩自然、敬畏自然、回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如贵州土家人的吊脚楼。吊脚楼用取之于大自然的天然材料，依据陡峭的山势建造，与自然融为一体。远远望去，在满山遍岭葱郁的树竹掩映下，土家山寨一栋栋木房依山势层递而建，与云雾缭绕的孤峰秀峦耸峙对列，形成极为清幽静谧的世外桃源，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贵州土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二）“知行合一”是贵州特有的人文精神

宋人张载曰：“贫贱忧戚，玉汝于成”，^[1]越是物质贫乏的地方，越能够锻造充实、稳固、强大的精神。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艰难条件下，贵州各族人民把苦难当做磨砺，把险恶当做阅历，乐观而淡定地生活着，塑造了贵州人坚韧不拔、不断开拓、敢于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砥砺奋进、跨越赶超的接力奋斗中，锻造了新时代贵州精神——“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2]可以说，大山的乳汁滋养了贵州各族人民，孕育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山魂，使贵州的历史进程中彰显着“知行合一”的行为准则，涌现着“知行合一”的生动实践。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得出的“大道理”和“真境界”即“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知行合一”，强调了道德行为中的“知”与“行”的绝对同一。“知”与“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自身所必然具有的道德意识与能力，二者是道德行为的一体两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知”与“行”相互渗透，不可分离，即道德实践与道德认知要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贵州作为“知行合一”思想的发源地，自然应把“知行合一”作为自己特有的人文精神。王阳明“龙场悟道”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后，黔中王门汤伯元、孙应鳌、李渭、马廷锡、陈尚象等积极践行“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为贵州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内在根据

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与“天人合一”密不可分。“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相生相融、和谐平衡，注重的是主客观统一的事实尺度；“知行合一”强调人的内在良知、认识水平与外在行为、俗间事功的一致性，彰显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尺度。二者连用，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因此，时任省委书记陈敏尔在贵州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倡导的“天人合一”既是世界观，又是辩证法；“知行合一”既是道德观，又是方法论。可以说，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连用，形成一个概念，是贵州的创造。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说：“作为一种表达性现实，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或文化丛的提出，都有其客观性的现实基础。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才构成了完整的世界体系。”^[4]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贵州人文精神，有其客观性的现实基础。一是对贵州先民相关朴素观念的继承、超越和提升。作为贵州人文精神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有着贵州地域的特定内涵。贵州先民所持有的类似“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诸多观念，是一种前现代的“集体无意识”，是与偏远险峻的山地环境和水平低下的生产

力相适应的朴素的生态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朴素的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贵州历史就是一部贵州人面对特殊自然环境筚路蓝缕，寻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宏大叙事，贵州人在实践中孕育出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朴素的价值观，经过世代贵州人的价值认同和身体力行，在内涵上构成了具有丰富生态意蕴的贵州人文精神。二是当代贵州人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追求。“天人合一”要求当代贵州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兼顾环境保护、资源确保永续利用和社会公正，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和谐相处。而“知行合一”要求当代贵州人凝心聚力，协力争先，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推动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同步全面小康、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的“内动力”和“软实力”。“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5]“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彰显了贵州人文精神的历史性、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与贵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工作总纲相适应，必将成为“撬动”贵州后发赶超、同步小康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

从生态伦理学视角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深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

（一）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生态和谐理念

从认识论角度看，“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贵州人文精神蕴含着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合一的生态理念。马克思强调，“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现代生态学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在其《大地伦理学》一书中，则认为人是自然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7]40}贵州先民世代代在自然之中生存，在与自然和谐共生、同环境友好相处中，逐渐认识到人的生命来自大自然，人是大自然生命的一部分，必须仰仗大自然才能生存，自然界的动物、山水、林石、日、月、星、云、雷、电的存在，与人的生命紧密关联。如侗族古歌《开天辟地》中唱道：“万年以前/天地不分/大雾笼罩/世上无人/云开雾散/把天地分/地在低层/天有日月星辰/地有万物生/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8]形象地说明了人类是从无生命的混沌原始物质演变而来。

被誉为“中国景观村”“百年环保第一村”的贵州锦屏县文斗苗寨，树与文斗人的生命紧密相连。他们视树为神，逢年过节，就会带上香纸和祭品，祭拜古树；子女出生，父母都会种一棵常绿树，有的父母还会让儿女认树为“干爹”“干妈”，祈福孩子平安成长。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的从江县沙苗寨，村民们在孩子出生这天必须到山上种一棵树，寓意新生命的降生；当他死后，则将象征其生命的这棵树砍来做成棺材，就地埋葬，并在旁边再种一棵树，表示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世。

在贵州土家人“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观念中，房屋也是一个生命体——一定要“活”而“灵”，即必须如有生命一样“活”着，它才会有“灵”，为主人带来好运。土家人认为村落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故在建造村落时，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村落的修建中，把与自然和谐和人文发迹联系起来，使整体村落与雄伟秀美的自然景观连成一片，水乳交融，形成了自然式山水园林景观布局，成为清幽静谧的世外桃源。

（二）敬天畏地、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情怀

从情感态度角度看，贵州人文精神饱含着敬天畏地、尊重自然的生态情怀。在贵州先民看来，人生活在自然的生命大家庭里，彼此生命同源、生命平等；自然佑护着人类，为人类提供生命之需，人类应对自然抱以感恩之心，怀以敬畏之情，以神圣

敬畏和仁爱感恩的方式对待自然，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回馈自然，保护好自然。如石阡县坪山乡佛顶山下的尧上仡佬族人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仡佬先民部落内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瘟疫，一只神鹰农历二月初一这天，叼来一棵仙草，挽救了整个村的村民。此后，仡佬族人将神鹰作为图腾，立下任何人不得伤害鸟类的族规，并把每年的二月初一定为“敬雀节”，并且举行隆重的仪式，充分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又如贵州土家人“安香龕”（中堂的神龕）时，主人要在头一天请“懂得规矩”的阴阳先生和木匠师傅来设坛，为其书写神龕上的堂郡和神主位。书写正中的“天地君亲师位”时，必须遵守“天字不出头、地字不分家、君亲不封口、师字无刀头”的原则。土家人认为，人在天地之间，天为大，地为大，人要敬天畏地，不能与天地争锋。否则，“不利”于主人家。“安香龕”仪式，充分表达了贵州土家人敬天畏地的生态情怀。

（三）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生活方式

贵州人文精神强调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实践，应是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自然界最懂自然”，“师法自然，就要掌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智慧。”^[9]古罗马时代著名哲学家塞内加也说，“真正的智慧在于溶入自然，取法自然”。^[10]正是运用这样的智慧，贵州人民将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自然，创造了真正的生态生活方式，实现了“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贵州“天无三日晴”，境内大多数区域潮湿多雨，故而贵州人喜食辣椒，因辣椒之热气正好可以消散因潮湿多雨而进入人体的湿气。贵州的酸汤有侗族的红酸汤和苗族的白酸汤之分，其中最负盛名的“凯里酸汤”由山番茄、红辣椒添加适量花椒、木姜子、薄荷叶等配制而成，富含多种维生素、8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较为丰富的蛋白质。贵州地处山区，蔬菜匮乏，贵州先民便通过“酸汤”补充维生素，在增强食欲的同时，弥补了蔬菜匮乏的不足，这些都是非常巧妙的生态养生之道！贵州先民的衣服原料主要是棉和麻，染衣服的染料主要是蓝靛和枫香叶，这些原料都取自天然，既生态环保，穿着又舒适、美观大方。贵州土家地楼与火铺的构造和使用，充分考虑了土家人所居住的环境和气候，使土家人在阴湿的春天减少了与潮湿地面的接触，冬天则减少了地面寒气的侵蚀；春夏湿热季节也是农忙时期，小孩与老人睡在火铺或木楼板上，既可以预防蛇、虫对小孩和老人的侵害，又能有效预防风湿类疾病。因此，对地楼与火铺的建造和使用，正是贵州土家人在认识自然环境与气候特性基础上所进行的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衣食住等方面的生态实践造就了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生活方式。

（四）因地制宜、巧夺天工的生态生产方式

贵州山多地少，没有平原支撑，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可以说贵州的农业生产条件很不佳，但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贵州的农产品却实现了自给且有盈余，这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勤劳勇敢且善于思考的贵州人民在长期的生态实践中因地制宜、巧夺天工，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如贵州人民因地制宜、顺势而为，除了将山间坝子、山坡开垦为耕地之外，还修建了大量的梯田，典型的有加榜、摆榜、野钟、堂安等。梯田是生态屏障，它具有保土、蓄水、调节气候的功能，对贵州良好环境的保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贵州酿造出了最引以为豪的茅台酒。依托于茅台镇赤水河谷自然环境和气候所形成的自然酿造环境，茅台酒酿造工艺充分利用环境中的微生物群，顺应自然节令规律，进行与赤水河水情变化相符合的“季节性生产”。正是因为师法自然、佳酿天成，茅台酒才成为我国唯一集“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于一身的白酒品牌。

三、贵州人文精神生态价值的彰显策略

今天贵州正在奋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更需要充分认识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意蕴——认同其价值，发挥其价值，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物化为力、转化为果，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

（一）加大对贵州人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的研究和转化

在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很多人错误地认为传统的就是落后的，现代的才是先进的，因而简单地抛弃传统文化。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学界对贵州人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研究不够，对贵州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缺乏清醒的认识，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也难逃此厄运。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善于继承和发展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因为有文化自信才能有底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32}因此，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贵州人文精神及其生态价值的研究，深刻把握其内涵要求，揭示其时代价值，尤其是要研究如何将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生态文明的新知在传统乡土文化的旧识上开花结果。

（二）高度重视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态传承”

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中有知识、有头脑、有体力的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造成农村人口“空心化”。地处西部的贵州，农村“空心化”问题尤其严重。在贵州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经商），只剩下所谓的“386199”部队（即老人、妇女、小孩）。“青壮打工去，收禾童与翁”，成了贵州多数农村的真实写照。随着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贵州农村劳动力出现了“断层”，“老人农业”现象凸显，农村也闹起了“农民荒”，这也使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和保护后继乏人。同时，现代农业科技像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同时，也弱化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削弱了农村传统乡土知识的传承和保护。

如今，已经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和科学技术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7]25}显然，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因此，在进行土地流转、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村危房改造和集体建房、生态移民等工程的同时，要把传统文化考虑进去；重视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如把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编成电影电视作品，通过多彩贵州的平台，体现贵州人文精神的魅力，让传统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典型的民族传统村寨，可谓展示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态形式”，要通过保护好这些村寨，实现贵州人文精神生态意蕴的“活态传承”。

（三）将学校作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殿堂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教育缺乏对传统文化方面应有的内容和教育。很多人虽然经过了小学乃至大学等学校的教育，却非常缺乏乡土传统知识，对传统文化及其蕴涵的生态价值也知之甚少。尤其是年轻人，掌握的现代知识越来越多，对传统文化却知道得越来越少。所以，应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如开发优秀的校本教材，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课堂、民族歌舞上舞台等，使其成为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殿堂。

（四）用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智慧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也必须遵循“知行合一”的原则，不仅要认识和认同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更要把它运用于生产过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化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贵州作为“欠开发、欠发达”地区，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关键在于经济动力。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就要运用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智慧，守住贵州的绿水青山，同时让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这就是习总书记对贵州的殷切期盼：“贵州过去发展慢、欠账多，还是要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人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践行“两山”理论，运用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智慧创新发展思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发展能够发挥贵州生态环境优势的五大产业，大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的生态化、规模化发展，做大做亮酒、烟、茶、药、食品“五张名片”，真正把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生产力，让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走出一条既要生存又要生态、既要温饱又要环保、既要百姓富又要生态美的生态发展新路，奋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总之，贵州“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人文精神蕴涵的万物一体、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敬天畏地、顺应自然的生态情怀，

师法自然、人与天调的生态实践，是贵州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与环境友好相处创造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度的永恒价值。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是人类发展不可违逆的规律。充分彰显贵州人文精神的生态价值，定能使其成为引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 [1]张载, 撰. 章锡琛, 校对.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63.
- [2]培育和弘扬新时代贵州精神[N]. 贵州日报, 2017-11-16 (01).
- [3]王守仁, 著. 张怀承, 注译. 传习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9.
- [4] (美) 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M]. 套成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167.
- [5]列宁全集 (第 5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82.
- [6]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6.
- [7]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7.
- [8]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 民间文学资料集: 第一集[C]. 凯里, 1981: 67-68.
- [9]曲格平. 师法自然创造绿色文明[N]. 人民日报, 2000-06-23.
- [10]赵白生. 生态主义: 人文主义的终结[J]. 文艺研究, 2002: 21.